



黄克富的无悔人生



黄克富(资料图片)

黄克富(1924—1999),男,宁夏西吉县人。4岁时父亲去世,11岁时母亲病故。8岁起给地主家放牛羊,15岁起给地主家做长工。1949年8月,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在西北野战军回民骑兵团当战士、副班长、班长。1951年

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部队时,曾参加过1951年在海原县甘盐池、庙山和西吉县偏城等地的剿匪战斗;1952年随部队来西吉参加了平息“四二”叛乱的战斗,曾参加过西吉县鸭儿湾梁、县城街道、固原县雾尔都山和白崖乡九条沟平叛作战。1952年8月转业到西吉县地方工作。同年10月任白崖区陶堡乡副乡长;1954年4月任乡长,同年12月后任白崖区党委副书记、书记。1958年9月在西吉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西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,同时兼任县农业局局长、县城农林水牧部部长;1959年元月在中共西吉县第三次党代会上当选为县委委员、常委,同年10月任县委书记处书记;1960年12月在西吉县第四届人代会上当选为西吉县人民政府县长;1973年3月被任命为西吉县革委会副主任;1981年1月、1984年1月在政协西吉县第二届、第三届委员会上当选为政协副主席,1987年7月主动退居二线,1989年7月离休,1999年9

月逝世,终年75岁。

黄克富一生热爱共产党,热爱人民,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,为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。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,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,生活艰苦朴素,为政清廉,不谋私利,为人谦和、平易近人,为西吉人民办了许多好事、实事,赢得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的尊敬和拥护。离休后,他继续为党为人民积极工作,长期坚持下乡,徒步或骑自行车深入基层、农村搞调查研究,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、法规,向有关乡镇、主管部门反映情况,协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。同时坚持经常做干部群众 的思想政治工作,遇到民事纠纷,积极调解。1990年被推选为“西吉县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”主席。1991年6月主动组织离休干部在城关镇3个居委会、8个村民小组走家串户,对600多名待业青年进行调查摸底,并对失足青年确定了帮教对象,积极开展帮教活动,挽救了一批失足青年。

1959年国庆节,黄克富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,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活动,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,并合影留念。1991年春,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离休干部先代会上,被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授予“全区离休干部先进个人”称号;1992年3月被宁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“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黄克富一生清贫,家无余资,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。他的工资、离休费常常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人民群众。当他从县政协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时,主动又从县级干部家属院中搬迁出来,住进了老干部家属院。还经常勉励其他一些离退休干部说:“我们这些人,自卑感不可有,自知之明不可无,要始终保持好晚节。”可以说,黄克富是一位真正做到为政清廉,不谋私利,两袖清风,一尘不染的人。

(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)

银川地区抗日救亡运动

宁夏工委建立后,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,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,广泛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活动。

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阵线,实现全中华民族抗战,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。宁夏虽地处西北边陲,经济文化落后,但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。从大革命时期到红军长征、西征,宁夏曾多次建立党的组织,进行革命活动,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宁夏又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,在北平组织了宁夏旅平学生会,积极参加革命活动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国共两党合作,深受各族、各界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。当时,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纷纷回到宁夏,在教育界和其他部门工作,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。宁夏工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,把争取团结这部分进步知识分子,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进行。特别注重做好争

取团结袁金章、雷启霖、李冲和等具有代表性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。

当时,袁金章在宁夏省党部任组织科科长,雷启霖先在学校教书,后在宁夏省党部任民运科科长;李冲和自1920年起在平罗县宝丰学校任教,在平罗一带有较高声望;另外,还有高立天、阎廷栋、潘钟林、杨茂林、叶松龄、刘廷栋等人,都是宁夏比较有影响的人物。宁夏工委成立后,除重点做好争取团结上述人员的工作外,还积极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军政各界做工作,将一批赞成抗日的进步分子团结在党组织周围,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,使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,推动了宁夏及周边地区抗日救亡运动。

1938年10月,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,马鸿逵也开始在宁夏抓捕共产党人。李仰南、何广宽等人当时已经暴露,袁金章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,把国民党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》的重要文件拿给李仰南看,并

说:“看样子,蒋介石马上要开始反共了,马鸿逵也要下毒手了。”告诫李仰南要多加注意,做好隐蔽工作。一天晚上,李仰南正在雷启霖家里谈事情,突然全城戒严,马鸿逵军警以清查户口为名,挨家挨户抓捕共产党。李仰南怕连累雷启霖,要出去躲避。雷启霖却让他藏在自己家炕上的一叠被子后面,躲过敌人的抓捕。还是在这个月,敌人抓捕杨文海时,高立天、涂春林冒着生命危险,护送杨文海出城,使其安全转移,奔赴延安。同年冬,敌人在抓捕杨一木、李东甫扑空后,关押了与他们接触较多的郭英勒、雍民飞等教师。尽管敌人威威胁利诱,但他们守口如瓶,敌人从他们那里没有得到有关杨一木、李东甫的半点信息。最后,杨一木、李东甫在李冲和的掩护下,安全脱险,到达边区。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,还有其他党的地下工作人员,都是在当地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掩护下脱险的。如:叶松龄、王延等掩护送走李宛,国民党区长李如檀开路条送走李平山,

先任宁夏中学校长后任金积县县长的贺自正掩护薛云亭、李志纯去延安。在阔别宁夏省城36年后,李仰南写信给当年掩护、帮助过共产党人的爱国民主人士袁金章的夫人向含秀,深情地追忆这段往事,信中写道:

“向含秀同志:您好!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就是30多年。前些日子,从丽生(袁金章)同志信中得知您的近况,今又接到您的来信,使我万分高兴。我到宁夏工作,第一个接头的人是您,在宁夏白色恐怖时期,最后见面的人还是您。革命困难时期,您对我的革命的同情、对我的招待和关怀,万分感激,终生难忘。遗憾的是丽生同志已去世,未能把当年艰苦岁月里担惊受怕的心情畅谈一番。”

在险恶的斗争环境里,银川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不顾个人安危,冒着生命危险,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,充分体现了他们抗日爱国的觉悟和情操。同时,也证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。(据银川党史网)

渠口沧桑

渠口堡是古石灰渠引黄开口之处,堡城因之而得名。1958年中宁人民开挖跃进渠,为开发红崖塘、木头井塘等处10多万亩山荒地创造了水利条件。自治区人民政府遂于1959年秋决定在该处建立国营农场。该地区待开发土地资源丰富,青铜峡库区建成后,可就近安置广武、渠口、彰恩等地淹没区移民,并取名渠口农场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渠口堡早已成为历史不复存在,而伴随着国营渠口农场的兴旺发达,渠口这个名字却越叫越响。它南起五塘沟,与枣园连接;北至梅家沟与广武衔接;东靠黄河岸、西据北山,方圆347平方公里,分铁桶、平塘、红崖3个灌区,辖9个农业队、7个园林队,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五业兴旺,成了名副其实的塞北江南、鱼米之乡。渠口已非原来意义上地名了。它既继承了老渠口人勤劳、朴实、不畏艰难困苦的传统美德,又寓意着新一代渠口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艰苦创业、改天换地的丰功伟绩。现就渠口及场辖灌区的历史变迁分述于后。

一、渠口兴衰

明正统年间有“石灰渠”的记载。渠口开在铁桶堡以下的郭家大湾。明洪武九年“废府,置卫”宁夏全境设置五卫(宁夏卫、宁夏左屯卫、宁夏前卫、宁夏右屯卫、宁夏中屯卫)、七所(灵州千户所韦州、鸣沙州、中卫、后卫、东兴兴武营、西路广武营),86屯堡中尚无渠口堡,这说明在古石灰渠渠口处建堡是明洪武九年以后之事。渠口堡原是一个傍山靠河的码头地方,也是通往银川的必经要道。民国时期,地方绅士们捐资沿黄河岸筑一护岸长堤,名曰“马公堤”(旌表马鸿逵之意),从上河沿来的船

筏多在这里停泊。加之“老鼠咀”要津摆渡过往行人,活跃了渠口堡的集市。1949年9月中宁解放,渠口堡是六区六公所所在地。1951年5月改为六区人民政府,辖铁桶、渠口、枣园、药师寺、沙梁、十里碑、广武等7个乡。1958年6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,撤销乡镇建制,成立“跃进人民公社”,公社管理委员会仍设在渠口堡(人们习惯称渠口公社),辖枣园、铁桶渠口、沙梁、十里碑、广武等6个管理区。1960年6月,渠口公社所辖的铁桶、渠口两个生产大队合并归属渠口农场。1967年渠口堡随着青铜峡水库淹没而消失,遗址平田种稻、生产粮食。要说留有痕迹,那就是紧傍渠口堡山头上的烽火墩依然屹立供后人凭吊。

二、铁桶堡变迁

铁桶堡建于明天启十年(1630年)。所以称“铁桶堡”,意在城池坚固。城堡与周家营子和摆滩相邻,地处滩涂。清乾隆年间成种土地45顷,引长永渠水灌溉。解放后是中宁六区的一个乡。人民公社化后,是渠口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。1960年5月合并到国营渠口农场成为农场的的一个灌区。

铁桶堡原来的自然村十分零乱,沟渠不配套,不适应机械化生产,加之跃进渠通水后的渗透和青铜峡库区蓄水后河床抬高影响,地下水位升高,盐渍化日趋加重。农场遂于1964年进行农田建设,开渠、平田、挖沟、排水,使铁桶灌区有了明显的改观。1971年对全场的沟、渠、道路、林带、居民点等进行全面规划,把铁桶堡原来零散的村庄,集中到3个居民点。1972年农场开挖了5000多米长的铁桶大沟,正好从城堡中心通过,使大

干沟两侧农田全部建成了沟渠路、林网配套,适宜机械化作业的条田。从此铁桶堡的旧村庄从根本上消失。1973年夏又改建太阳梁沟下游沟道2000多米,并在90度转弯处用混凝土板、片石砌护沟坡660米,把洪水安全地导入黄河,保护了农田。黄河对农场境内铁桶堡灌区二、三、四队的沿河耕地冲刷过甚,为彻底根治,沿河又做了丁字石坝3道,各长310米,修筑黄河防洪围堤5000多米,不仅减轻了冲塌,且干涸了渠口堡旧河槽数千亩地,使铁桶灌区更加安全。1983年,沿铁桶大沟下段低洼地开挖鱼池1100多亩,年产20多万斤鲜鱼,供应市场。

经过30多年的奋斗、治理,铁桶灌区已垦种耕地1万余亩,年产粮食占全场的60%以上。一个昔日分散的、灌排不畅的滩涂,变成了整齐有序、适于高度机械化作业的新灌区。

三、平塘曙光

平塘是黄河二级阶地,场部设在这里。建场前平塘是一片荒漠,系石灰钙土,且土层深浅不等,有机质含量低,结构性差。自1960年始,进行了一些小面积开发。1964年3月农场又在平塘作农田建设试点,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,规划一片,施工一片,年复一年一直未停。1965年6月,又借鉴洪漫地的经验利用洪水淤地。农场在破石沟下游(现在的种子队)修筑拦洪堤,淤出了大片平展的土地。到1969年,平塘已开出可耕地10000多亩,其中扬水灌溉1000多亩。为改良土壤,培肥地力,先后采取秸秆还田,轮种苜蓿、草木樨,复种葵花、箭舌豌豆等绿肥。现在平塘土质已变为沙壤或轻壤土,有机质含量提高到1%左右,粮食产量逐年上升,

大部分农田亩产在千斤以上。1982年在平塘下段的1000多亩大沙窝,集中机车和劳力平沙造田,水泥砌护渠道,栽种上果树。平塘灌区目前农业队有一队、五队、六队、种子队。园林队有:园一队、园二队、园四队、园五队、园六队。直属单位设在场部周围。随着小城镇的迅速崛起,以渠口镇为中心的平塘灌区已成了109国道上一颗明珠。

四、红崖新色

红崖是一座红土丘陵,高20多米,宽300多米,长期被山洪冲刷切割形成悬崖,因此而得名。明弘治《宁夏新志》列为中卫十景之一。因是边防一隅,《嘉靖宁夏新志》列景时附有“红崖秋风”的诗:“寥落边关,空山风撼”,反映了当时红崖的荒凉。现在崖下400多亩荒地经跃进渠水淤澄变成良田,加上逐年营造的防风林和护堤林带烘托,绿树成荫,鸟语花香,成了荒山上的一片绿洲,所以人称“世外桃源”。以红崖命名的红崖灌区原是渠口农场的种子繁殖基地,后改农八队,上世纪80年代末栽种果树,变成园林七队。周围的红崖灌区还有农七队(原来的九队)、农八队(原来的十队)、园三队。和平塘灌区一样,红崖灌区从无到有,从开发到利用,渗透着广大农场职工的辛勤与汗水。红崖灌区内与红崖齐名的还有芦沟湖、四眼井、元昊离宫遗址。它们和红崖相距不到10里,都在历史上辉煌一时。芦沟湖,在羊头山古长城脚下,距渠口农场场部约8公里。有泉数眼,甜冽清澈,尝为畜牧者赖之,入夏集水成湖,绿荫盖地。此地有山有水,为当年边防之一隅。东北向一公里处有四眼井,再向东三公里处便是红崖。(据《中宁文史资料》)



陕甘宁边区征粮收据。(资料图片)

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公粮运动,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胜利,而且彰显了党艰苦奋斗、务实进取的作风,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拥护与支持。

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区的统战工作

抗战初期,陕甘宁边区人马较少,财政政策以争取外援、休养生息为主,一般农民负担较轻。皖南事变前后,外援断绝,内需增加,中共的财政状况变得异常紧张,农民公粮负担急剧上升,社会矛盾凸显。对此,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倡导征粮调查,加强民主组织,合理分配各阶层农民公粮负担。另一方面,推行精兵简政,开展大生产运动,由此大大减轻了救国公粮的征收任务。

1937年,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,国共两党关系平稳,陕甘宁边区赢得了一段“争取外援,休养生息”的契机。国民政府发放军费相对及时,外援收入是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:1937年占77.2%;1938年占51.6%;1939年占85.8%。边区脱离生产的军政人员数量较少,不过三万人左右,需粮有限。因此,1937年、1938年边区征粮1万石,1939年征粮5万石。在征粮方式上,采取政治动员、自愿缴纳的办法,征募对象主要是地主、富农,一般农民负担较轻。不足部分,由政府向地富以官价购买或在西安、洛川采购。

自1940年始,由于国共两党关系逐步恶化,国民政府一再拖欠八路军、新四军军饷,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彻底停发,如何解决经费问题成为极为棘手的事情。除了开征新税种以外,主要是增加救国公粮的数量,1940年边区征粮9万石,1941年更是急剧增加到20万石,占当年总收入的13%。然而,这一时期,边区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灾荒。1941年春夏,各县呈报灾情要求救济的告急文如雪花飞来。华池、安塞、志丹等县甚至出现“抢粮”风波,社会矛盾一触即发。显然,1941年是征粮最困难的一年,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,大家都疲惫了,有的征粮工作团除夕夜还在催收粮款。因此,1942年12月高干会议后,中共便开始着力通盘整顿边区政治、经济等系列活动。

开展征粮调查运动

开展征粮调查运动,加强民主组织。公粮负担既有重不重的问题,也有公不公的问题,大多数农民都怀有“不怕重只怕不公”的心理,“公平”是农民的基本要求。1942年以后,陕甘宁边区的征粮机制改变了过去劝募动员方式,开始实行普遍调查,按条例累进征收,合理调剂各阶层农民负担。与此同时,各级民主组织也逐步发展、健全起来,诸如征粮委员会、参议会等,实质都是引入民主的力量。1942年,吴堡县还创制了“村评议会”的形式,吴堡县委组织部部长韩文潮说:“‘村评议会’是由各村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,它就和村庄人民有血肉联系,它不是如一般人所了解的那样,简单地只是起了评村庄的人民是否交报的消极作用,重要的是它起了宣传和推动人民‘交报’及在‘征收’积极推动与组织作

用。”1942年以后,调查和评议的结合,使边区各阶层农民负担更加公平合理,推动了抗日各阶级统一战线的发展。

精兵简政

精兵简政是为了解决“鱼大塘小”的矛盾。陕甘宁边区1941年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,虽然边区人民负担极重,但机关部队仍出现物资匮乏、衣食缺乏的情况,边区产生了“鱼大塘小”的矛盾。早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,李鼎铭等人就提出“精兵简政”的提案,即“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,实行精兵简政主义,避免入不敷出、经济紊乱之现象”。1942年高干会上,毛泽东再次强调:“精兵简政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。”号召全党严格推行精兵简政工作。到1944年1月精兵简政运动结束时,边区政府津贴的机关单位从35个减少到22个,边区一级政府部门减少了四分之一,分区和县级政府部门从8个至9个减为4个至5个,由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所给养的兵力数量。从1942年起,救国公粮任务开始下降,直至抗战结束,每年基本稳定在16万石左右。

发展生产

事实表明,生硬地提高征粮数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,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。毛泽东指出:“财政困难,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;忘记经济发展,忘记开辟财源,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,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。”所以,全边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1942年,边区部队粮食基本实现自给,1944年开始向政府上交公粮。据统计,边区1944年收的公粮比1940年减少了1800万磅。当然,大生产运动不仅仅是治理经济危机的重要举措,同时也有强大的政治效应,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说:“随着战争的进展,地方征粮逐渐减少了。人民看到,政府要求他们多生产,并不是为了养活更多的寄生虫。在过去的封建时期,在农民的思想上,政府的含义只不过是养活寄生虫。现在这个观念变了。”应当说,大生产运动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优良形象。

全面抗战时期,陕甘宁边区26个县、100多万人口,支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走向胜利。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回忆峥嵘“税”月,既为呈献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伟大延安精神,同时也为时刻铭记供养战争胜利的土地和人民上的人民。

(据《团结报》)

陕甘宁边区的征粮历史探析